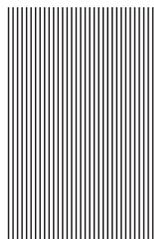




DOI:10.16486/j.cnki.62-1035/d.2016.01.005



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的历史传统与现实意义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6)01-0051-10

● 丁 俊

摘要 :中国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历史悠久 ,内容丰富。千百年来 ,中外穆斯林在经济、文化以及宗教领域一直保持着联系 ,往来不绝。中国穆斯林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 ,既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交往、交融的历史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中国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交往领域不断拓宽 ,交往层次显著提升。今天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 ,中国伊斯兰教界和各族穆斯林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更加自信的精神开展国际交往 ,对于弘扬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 ,抵御和防范各种极端思想的流布 ,增进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国穆斯林之间的友谊 ,弘扬“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 ,促进中国人文外交事业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穆斯林 ,伊斯兰教 ,国际交往 ;人文外交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志码 :A

中国各族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开展的国际交往历史悠久 ,内容丰富。这种交往 ,自唐、宋时期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来就一直不曾间断 ,延续发展 ,至今不衰。和平精神与爱国精

[基金项目] 本文属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陆丝绸之路上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间的宗教交往研究”(编号 :14BZJ029)的阶段性成果。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6年第1期(总第88期)

2016.No.1(Total No.88)

神始终贯穿着中国穆斯林的国际交往活动。千百年来,中外穆斯林在经济、文化以及宗教领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往来不绝。中国有10个穆斯林少数民族,总人口超过2300万。中国穆斯林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期以来中外文化特别是中华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交往、交融的历史成果。今天,在中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开放、着力实施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下,中国各族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和更加自信的民族精神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与世界各国穆斯林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交流互动,对于弘扬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提振和释放伊斯兰教正能量,抵御和防范各种极端思想的渗透和传播,增进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国穆斯林之间的友谊,促进中国人文外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历史的回顾

1300多年前,伊斯兰教经海、陆丝绸之路和平传入中国。遍布全国各地的大量历史遗迹以及丰富的中外文献证明,古老的海、陆丝绸之路,是中国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开展国际交往的历史通道。在广州、泉州、扬州、杭州、西安、北京等大都市,迄今犹存的古老清真寺、穆斯林先贤墓园以及出土的古代碑刻,都是中外穆斯林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阿拉伯帝国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本·阿凡(577~656)遣使来华,这是阿拉伯方面与中国的首次正式官方联系。“唐王朝经济文化发达,在当时闻名于世。据说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说过:‘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句名言激励了阿拉伯、波斯穆斯林络绎不绝地前来中国,他们频繁往来于贯通东西的海陆交通线上。据中国史籍《旧唐书》和《册府元龟》记载,自永徽二年(651)至贞元十四年(798)的147年间,仅大食向唐遣使就达39次之多。”^①足见唐与阿拉伯之间官方交往的频繁。历史上,特别是唐、宋、元时期,中外穆斯林友好交往活动的主要形式是经贸往来,单纯的宗教交往与互动现象较为少见。这时期,大量阿拉伯、中亚等地区的国外穆斯林梯山航海,来华经商,许多穆斯林以“蕃客”身份定居中国,积久成群,形成相对集中的居住区“蕃坊”,进而逐渐华化,开启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海、陆丝绸之路的繁荣,使中国的印刷、造纸、制瓷、纺织等方面的先进技术西传,经阿拉伯而远至欧洲,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也在丝路大通道上东渐,穆斯林相对先进的科技文化传入中国,涉及宗教、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军事等许多领域,仅元代秘书监收藏的“回回书籍”就达242部之多。^②宋人周去非著有《岭外代答》,其中专门有《大食诸国》一卷,介绍了西亚阿拉伯地区的情况,还特别描述了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形胜。元代著名航海家汪大渊曾两度远涉重洋(1328~1332;1334~1339),穿行阿拉伯海和红海,远至今日索马里、摩洛哥等地,所撰《岛夷志略》一书,记述了当时阿拉伯地区的情形和中、阿交流状况。中世纪阿拉伯穆斯林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1304~1377)曾来中国游历多年,遍访泉州、广州、杭州、大都(北京)等通都大邑,在其《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有大量关于元代中国

① 《回族简史》编写组.回族简史(修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9.

② (元)王士点,尚企翁.秘书监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社会及中阿交往的历史记载。^①

明、清以降,始有中国穆斯林走出国门,或沿海路下西洋,或经陆路出西域,开展与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穆斯林的友好交往。明朝初期回族航海家郑和(1371~1435)七下西洋的壮举举世闻名。郑和于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八年间,率领庞大的船队七次南下西洋,先后到访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今天的阿曼、沙特阿拉伯、也门、索马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担任随行通事的马欢、郭崇礼、费信、哈三、沙班等均为熟知阿拉伯语的穆斯林。马欢、费信和巩珍还分别撰有《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详细记载了郑和所到地区的山川形胜和社会状况,成为了解明代中外特别是中阿友好交往的珍贵史料。

中国穆斯林赴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游学是中国伊斯兰教界国际交流及中外穆斯林友好交往的重要内容。早在新疆地区喀拉汗地方王朝(10世纪初~1212)时期,就有一些维吾尔族伊斯兰学者前往阿拉伯地区求学,如《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马哈茂德·喀什噶里(约1008~1105)就曾在巴格达等地求学多年,其《突厥语大词典》也是在巴格达求学期间编纂的,完成后于1074年献给了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明清以来,有不少回族穆斯林经师在前往麦加朝觐的过程中,也大都滞留当地,访学拜师,研习教义。例如,经堂教育的创始人胡登洲以及其后的著名经师马来迟(1681~1766)、马明心(1719~1781)、马德新(1794~1874)、马万福(1849~1934)等,都曾有在阿拉伯地区游学、开展宗教交流的经历。^②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国门大开,大量中国人远赴东洋、西洋,或留学,或考察,中外文化交流蔚然成风,中国穆斯林的国际交往活动也日趋频繁,形式多样。王皓然(1848~1919)、王静斋(1879~1949)、达浦生(1874~1965)、马松亭(1895~1992)、庞士谦(1902~1958)等知名阿訇多次深入中东伊斯兰世界腹地,作实地的考察,拜师访学,了解伊斯兰世界思想文化新潮及社会发展大势,更有马坚(1906~1978)、纳忠(1910~2008)等一批青年学子远赴埃及留学,系统研习伊斯兰文化,并及时向国人予以介绍,有力推动了中外伊斯兰文化的交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各族穆斯林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国际交往,积极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正义事业,处处彰显出中国穆斯林赤诚的爱国主义情怀,诸多交往事迹感人至深。例如,1937年上海沦陷后,64岁高龄的达浦生阿訇愤慨万分,当他得知中国在中东地区缺少对抗战事业应有的舆论宣传,在中东国家甚至连一张阿拉伯文传单都没有,而日本却派遣浪人潜入该地区,颠倒黑白,歪曲侵华事实之后,便毅然决定自费前往中东,以自己的声望宣传中国抗战的正义事业。1937年12月,达阿訇远赴埃及,晋见国王法鲁克,拜会爱资哈尔大学校长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表演说,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宣传中国抗日,《金字塔报》及《埃及邮报》等均予以报道。达阿訇又借朝觐之机赴沙特阿拉伯作更广泛的宣传,多次发表讲演,力陈日本暴行,还参加了“世界回教大会”,向伊斯兰国家政要和宗教领袖传达了中国的抗日的决心。沙特国王伊本·沙特(1880~1953)两次接见阿訇。达阿訇感到仅作口头宣传还不够,便在麦加起草了《敬告世界回教教友书》,向各国穆斯林散发。复返埃及后,又撰写了《告全世界回教教友书》,在《金字塔报》上连载,引起埃及和世界各国穆斯林的极大关注。1938年

① 参见江淳、郭应德.中阿关系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

② 参见李兴华等.中国伊斯兰教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6月,达阿訇抵达印度,在德里发表九次演讲,拜见了此后成为巴基斯坦国父的阿里·真纳(1876~1948)。真纳表示中国的抗战也是印度各族人民的抗战,他嘱人将阿訇的《告全世界回教教友书》译为印地文,刊登在《印度时报》和《孟买新闻》上,还在印度穆斯林中募捐资金,买成药品,送往中国,支持抗战。达浦生阿訇以满腔的爱国热忱,不辞辛劳,奔走海外,宣传抗日,历时八个月,取得了巨大成功。1938年8月,他带着各国穆斯林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意和对中国抗战的有力声援,携带几十万法币的捐款取道香港回国。重庆《新华日报》于1938年8月8日和10月3日以《上海回教长达浦生欢迎会》和《达浦生先生访问记》等专文报道了达阿訇的这次出访及其意义。^①

再如,中国穆斯林有识之士王曾善、马天英、薛文波、张兆理、王世明等曾组成“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于1938年1月出国西渡,远赴中东各国,宣传中国抗日,取得巨大成功,正如访问团团长王曾善在《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日记》中所言:“本团使命,在以国民外交之方式,向近东回教各国宣传我抗战之意义,联络各国回教民族之感情,每至一处,深蒙当地朝野回教人士热烈同情,收效之巨,多非始料所及。”^②留学埃及的马坚、纳忠、林仲明、林兴华等青年学子更是在尼罗河畔散发传单,作演讲,搞募捐,高唱爱国歌曲,谴责日寇侵华暴行,广泛宣传抗日。穆斯林青年的爱国热情使到访埃及的陶行知先生感动不已,他在1938年7月17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题为《卅一个中国回教徒留学生》的文章,对海外中国穆斯林青年的爱国热情给予高度评价和赞誉:“到了埃及,有一件事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尼罗河畔夕阳笼罩着的金字塔下,一曲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传向沙漠的边际去,这是三十一个中国回教徒留学生工作之余的歌声。谁也不曾想到,在这古国的沙漠里,听到我们民族的吼声。……他们所进的学校,是世界最古的学府——爱资哈尔大学。这所大学创办了已有九百九十八年的历史。这些留学生,每人每月十金洋,一切烧饭、洗衣等杂务,都得自己动手。抗战后,对于祖国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是有着极高度的同情和热望,他们在勉强维持的生活费中,还提出一点钱,在海外对侮蔑祖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作强烈的抵制宣传。”^③

二、新中国建立后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相关国际交往活动有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参与和热情关心,交往领域不断拓宽,交往层次显著提升。1952年8月,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新中国第一个穆斯林朝觐团组成,因为当时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尚未建交,故朝觐团先到巴基斯坦,委托巴方代为申请签证,但未获准。朝觐团在巴基斯坦滞留期间,先后访问了卡拉奇及拉合尔等城市,增进了中巴穆斯林之间的传统友好关系。1953年5月,中国各族穆斯林的全国性宗教组织“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为有效开展中国伊斯兰教界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宗教

① 参见达浦生.伊斯兰六书[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② 王曾善.中国回教近东访问团日记(自序)[M].马来西亚吉隆坡再版,1997.9.

③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3卷)[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原载:重庆《新华日报》,1938-10-17.



交往提供了重要平台。中国伊斯兰教界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各国的宗教交往日渐频繁,重要国际交往活动有:

1955年4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达浦生阿訇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宗教顾问参加了万隆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不忘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事宜,亲自向沙特阿拉伯首相费萨尔亲王提出,希望沙方为中国穆斯林给予朝觐签证,达浦生阿訇也在会议期间会见了埃及宗教事务部部长,并邀请部长访华。当年5月,埃及宗教事务部部长巴库尔一行即来华访问,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会见了巴库尔一行,成功掀开了中阿宗教交往的新篇章。7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中国穆斯林朝觐的国际通道成功打开,新中国第一个穆斯林朝觐团顺利成行。以中国伊协副主任达浦生为团长的中国朝觐团在沙特阿拉伯期间,受到沙特国王、首相的接见和宴请。完成朝觐功课,朝觐团还访问了埃及、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受到各国总统、元首的接见和广大穆斯林的热烈欢迎。

1956年5月,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访华期间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5月,巴基斯坦宗教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同样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7月,中国穆斯林朝觐团再次顺利赴沙特阿拉伯朝觐,朝觐团团长沙尔汗还应邀参加了清洗天房的盛典。朝觐结束后,朝觐团还分两路访问了亚、非部分伊斯兰国家,开展友好交往。

1958年9、10月间,以阿比丁博士为团长的阿联叙利亚地区伊斯兰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访华期间代表团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观礼,并受到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9年1月,阿曼国副教长萨拉赫·艾萨·哈尔塞一行应邀来华访问,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接见。1960年11月,北也门穆斯林代表团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1963年10月,塞内加尔伊斯兰教协会会长老易卜拉欣·尼阿斯一行应邀来华访问,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会见了易卜拉欣长老一行。1964年9月,苏丹前宗教大法官阿里·阿布杜拉赫曼应邀来华访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65年3月,中国伊斯兰教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伊斯兰会议”,出席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1966年4月,中国穆斯林代表团出访苏丹、伊拉克、科威特、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基斯坦6国。

文革期间,中国穆斯林的国际交往受阻停滞。改革开放后,中外穆斯林宗教交往重新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发展,交往层次不断提升,交往范围日益广泛,交往内容更为丰富。多年来,中国各族穆斯林国际交往的足迹遍及伊斯兰世界,甚至远及欧美等诸多非伊斯兰国家,前来中国访问的国际伊斯兰教界领袖及穆斯林友好人士和使团络绎不绝。重要国际交往活动有:

1979年,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的朝觐活动恢复,中国穆斯林朝觐团16人顺利赴沙特阿拉伯麦加朝觐。7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受到齐亚·哈克总统的接见。8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白寿彝一行应阿尔及利亚宗教事务部邀请,参加了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的“第13届伊斯兰思想讨论会”。1980年1、2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团应邀前往伊朗参加“伊斯兰革命一周年庆祝活动”,受到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接见。1981年3月,北京外语学院纳忠教授出席了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举行的“国际穆斯林学者大会”。5、6月,以艾哈迈德·萨拉赫·加姆朱姆为团长的世界伊斯兰联盟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这是世界伊盟组织的第一个访华团,访问团代表世界伊斯兰联盟向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捐赠50万美元。1983年10、11月,中国穆斯林代表团访问苏丹、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受到了各国有关领

导人的接见。11月,巴基斯坦穆斯林学者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国务委员姬鹏飞会见了全团。1985年11月,应世界伊斯兰联盟秘书长的邀请,以司马仪·艾买提为团长的中国穆斯林副朝访问团访问沙特阿拉伯。1986年10月,世界穆斯林大会代表团应邀访华,万里副总理会见了代表团。1987年12月,在中国有关部门及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帮助和支持下,伊斯兰世界联盟在北京召开了“伊斯兰宣教讨论会”。1988年9月,北京大学教授刘麟瑞应邀出席在突尼斯召开的“两圣地神圣会议”。1989年9月,以伊朗伊斯兰宣教组织主席阿亚图拉·贾纳提为团长的伊朗伊斯兰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访问期间,受到了国家副主席王震、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的接见。1991年1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团应邀赴伊朗参加伊朗伊斯兰革命12周年庆祝活动,受到伊朗宗教领袖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接见。9月,印度尼西亚伊斯兰友好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会见了代表团。1994年6月,中国穆斯林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马来西亚,并参加了马来西亚举办的“94世界伊斯兰文化节”展览活动。马来西亚国家元首会见了我国代表团,马哈蒂尔总理参观了中国馆的展览,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9月,伊斯兰世界联盟赠送新疆地区30万册《古兰经》维吾尔语译本。

2001年5、6月,应埃及宗教基金部部长邀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团出席在开罗召开的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第十三届大会。7月、8月,利比亚伊斯兰宣教协会秘书长谢力夫一行应邀来华访问,全国政协副主席白立忱、中联部部长戴秉国、国家宗教局领导分别会见了代表团。2003年12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陈广元会长出席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伊斯兰世界机遇与挑战国际会议”,并在会上宣读了题为《与时俱进的中国伊斯兰教》的论文。2004年4月,应埃及宗教基金部长、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主席邀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团出席在开罗召开的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第十六届大会。6月,中国大陆穆斯林代表团赴台湾地区进行考察访问,这是中国伊协首次组团访问台湾地区穆斯林。6月,以世界伊斯兰联盟秘书长阿布杜拉·本·阿布杜勒·穆赫辛·图尔基博士为团长的伊盟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布都热西提、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接见了代表团。9月,中国伊斯兰教教务指导委员会考察团对叙利亚、摩洛哥、埃及等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2006年4月,应伊斯兰世界联盟秘书长的邀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出席了在麦加召开的首届穆斯林学者论坛暨伊斯兰最高组织协调委员会大会的第一次会议。8月,由国家宗教局和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联合组成的中国朝觐工作考察团对马来西亚、土耳其、伊朗、印度尼西亚等四国进行了考察访问。

2007年6月,沙特麦加禁寺伊玛姆阿布都热合曼·阿布都阿齐兹·苏岱斯长老应邀对我国进行了访问。8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参加在麦加召开的伊斯兰组织最高协调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11月,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主席谢赫·拉威尔·盖努特金和俄罗斯伊斯兰文化中心主任尼亚佐夫·阿卜杜勒·瓦赫德·瓦立多维奇一行应邀前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会见了盖努特金主席一行。2008年10月,应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主席谢赫·拉威尔·盖努特金的邀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代表团对俄罗斯进行了为期七天的友好访问。^①

^① 上述活动内容参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编.中国伊斯兰教简志[M].北京:宗教文化



2009年11月,世界穆斯林学者联合会主席盖尔达维博士应邀到访中国,参加了“中阿学者论坛”。中阿学者就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作了专题研讨,盖尔达维就此发表了专题演讲,呼吁穆斯林彻底摒弃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思想,强调以和平、仁爱、宽容为核心的“中正和谐之道”才是伊斯兰教的“正道”。盖尔达维还参观访问了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等高校以及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等穆斯林社区,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对话”栏目的专访,就中阿关系、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等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2010年8月,应中国伊协邀请,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伊斯兰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尼亚佐夫为团长的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10月,以伊斯兰世界联盟秘书长阿卜杜拉·图尔基博士为团长的伊盟代表团应邀访问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了代表团一行。2011年2月,应土耳其共和国宗教事务局的邀请,以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为团长的中国伊斯兰教代表团对土耳其进行友好访问。6月,应国家宗教事务局的邀请,土耳其宗教事务局代表团访问中国,其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会见了代表团。2013年6月,沙特麦加禁寺伊玛目萨利赫一行来华访问,国家宗教局领导会见了来访客人。萨利赫一行还深入到中国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考察访问,受到当地穆斯林的热情欢迎,中国穆斯林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中国穆斯林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给客人留下了深刻印象。2015年10月13~16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一行6人出席了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一届亚洲及太平洋国家穆斯林宗教领袖峰会”,来自37个国家的宗教部长、穆斯林宗教领袖、伊斯兰学者125名出席会议。陈广元会长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生存与发展的体验》的演讲,得到与会者的赞誉和好评。

近年来,中国穆斯林赴麦加朝觐的人数不断增加。2015年,共有1.45万名中国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中国政府各级有关部门以及沙特朝觐部均为此提供了诸多便利。中沙双方密切合作,精心组织,使中国穆斯林的朝觐工作规范有序、高效和安全,广受中外穆斯林的赞誉。一年一度的朝觐活动业已成为中国穆斯林展示爱国爱教爱和平的自身形象,有效开展宗教交往和人文外交的重要国际活动。

值得称道的是,在上述各项交往活动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一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联络、组织作用。多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伊斯兰世界联盟、世界穆斯林大会、伊斯兰发展银行等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国际组织及埃及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伊朗伊斯兰文化与关系联盟等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宗教组织和机构建立起广泛联系,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元首或政要访问中国期间都曾到访过中国伊协。近年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几乎每年都组织派遣代表团参加国际伊斯兰宗教活动与学术会议,并向埃及爱资哈尔大学、沙特阿拉伯麦地那大学、巴基斯坦国际伊斯兰大学等伊斯兰世界著名高等学府选派和推荐优秀中国穆斯林青年留学深造,还与一些国家的伊斯兰教组织和机构合作,多次举办了旨在增强互信、推进交流、弘扬“亲诚惠容”人文理念的文化活动。建国初期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已然成为中外穆斯林开展宗教交往和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周恩来总理对民间人文外交的关心及其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也由此可见一斑。

出版社,2011;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编.光荣60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M].2013.

三、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的现实意义

1. 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是中国人文外交的重要领域和宝贵资源

弘扬和平精神,积极开展国际交往是中国各族穆斯林及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历史传统,正是由于中外穆斯林频繁的交往互动,才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两大文明体系的密切交流,中国穆斯林的独特民族文化正是这两大文明交流、交汇、交融的历史成果。值得称道的是,和平交往是中阿文明交往的历史主轴和基本特征,堪称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典范。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都倡导和平和谐的价值理念,两大文明丰富的文化内涵使中外穆斯林能够交而互通、求同存异,包容多样性、特殊性,追求共同性、普遍性,和而不同,交而不恶。这是历史上中外穆斯林开展文明交往的宝贵经验,也是中国穆斯林国际交往能够成为今天中国人文外交重要环节的历史基础。

从清末到民国,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穆斯林有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鲜明和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与全国各族人民共赴国难、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是前所未有。因此,这时期中国穆斯林的国际交往也大大超越了历史上固有的以经贸交往为主、以宗教交往为辅的简单模式,开始提升到国民外交的新层面。

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竭力挤压新中国的外交空间。在此艰难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界和各族穆斯林开展的一系列国际交往活动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有效发挥了民间人文外交辅佐国家外交的重要作用,在突破西方大国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促进中国与亚非国家友好交往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除了朝觐这一重要宗教交往活动得到恢复和发展外,中国穆斯林还在更加宽广的领域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际交往交流活动,如组团外出访问考察、举办文化艺术展览、参加《古兰经》诵读国际比赛及各类国际学术会议等,广泛宣传中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客观介绍中国穆斯林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交流活动均受到各有关国家相关部门和当地穆斯林团体的热情接待,中国穆斯林访问团成员还多次受到各相关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长期以来,在中国国家宗教局等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各有关宗教团体、爱资哈尔大学等宗教院校、相关学术机构以及伊斯兰世界联盟、伊斯兰发展银行等国际组织保持着密切交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及世界其他各国的穆斯林友好人士和使团频繁访华,他们深入全国各地穆斯林社区考察访问,目睹了中国穆斯林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切实感受到了中国政府平等、自由的民族宗教政策,不少来访者还受到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们的来访和实地考察,不仅对中国人民和中国穆斯林的友好情谊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且有效消除了长期以来西方舆论关于中国民族宗教政策的各种歪曲宣传。

新中国穆斯林在其国际交往活动中始终拥护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在重大国际事件中频频发声,明确表达中国伊斯兰教界及中国各族穆斯林捍卫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侵略战争、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的严正立场,声援包括巴勒斯坦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穆斯林反对侵略战争、争取合法权利的正义斗争。例如,1981年12月27日,中国伊协主任张杰应



北京广播电台的邀请,就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两周年发表广播讲话,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霸权主义行径,坚决支持阿富汗人民反抗侵略的正义斗争。1994年3月1日,中国伊协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屠杀巴勒斯坦人的罪行。1999年5月8日,中国伊协等全国五大宗教团体就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野蛮行径联合发表抗议信,同月,中国穆斯林海外留学生在埃及开罗、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等地举行游行活动,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飞机轰炸我驻南使馆的暴行。2003年3月22日,中国伊协发表声明,对美国等国家不顾国际社会的反战呼声而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表示愤慨和谴责,并对遭受战争创伤和痛苦的伊拉克人民深表关切和同情。声明表示,中国穆斯林完全拥护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强烈呼吁美国等国家停止战争。^①新中国穆斯林开展的一系列国际交往活动,和风西送,向国际社会有效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民族平等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客观介绍了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成功展示了中国穆斯林恪守伊斯兰教中正宽容精神、热爱祖国、热爱和平、自信自强、积极进取的良好形象和风采。

在国家外和万邦、内安百姓、着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倡议的新形势下,中国各族穆斯林开展国际交往的前景将会更加广阔。习近平主席讲道:“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顺应了时代要求和各国加快发展的愿望,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具有深厚历史渊源和人文基础,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要集中力量办好这件大事,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近睦远交,使沿线国家对我们更认同、更亲近、更支持。”^②显然,中国各族穆斯林的国际交往必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相关领域的国际交往已然成为中国人文外交的重要环节和宝贵资源,在国家的对外友好交往与改革开放事业中,特别是在促进我国与丝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方面发挥日益显著而独特的作用。

2. 中国穆斯林国家交往的良性互动是释放伊斯兰教正能量的有效途径

中国伊斯兰教源在外,流在内,因此,积极推进中国伊斯兰教界和各族穆斯林与世界各国穆斯林在国际交往中的良性互动,是有效提振和释放伊斯兰教和平中正、和谐宽容的正能量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伊斯兰世界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思想对中国穆斯林也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妄断他人”、曲解“吉哈德”等各种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广泛传播,甚至在部分中国穆斯林中也有渗透,这些思想的传播严重危害了社会和谐、民族团结,也损害了倡导和平、宽容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形象。要引导广大穆斯林远离各种极端思想的病毒,就必须从思想上去防范、化解和抵御各种极端思想的侵蚀。中国伊斯兰教界和广大穆斯林不仅要发出明确的声音,旗帜鲜明地谴责违背伊斯兰教教义的各种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行径,更要正确传达和践行伊斯兰教的和平、仁爱精神,恪守伊斯兰教和平、宽容的中正之道,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真正成为敬主爱人、恪守中正的虔诚之士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忠诚信士,也才能成为合格的中国公民。

^① 参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编.中国伊斯兰教简志[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

^② 人民网.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 强调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4/1106/c70731-25989646.html>.

因此,及时了解、学习国外特别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思想家们从宗教思想层面防范、抵御和化解极端主义的一些思想方法和理论,显得必要而迫切,因为这些思想方法,不仅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文化重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伊斯兰教界深入开展解经工作,对中国穆斯林弘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构建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的和谐社会均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显然,积极开展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国际交往与宗教交流,特别是加强与伊斯兰世界主流思想界的交流互动,将有助于正确阐释和广泛宣传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最大限度地释放伊斯兰教中正和平、宽容仁爱的正能量,有效防范和抵御宗教极端主义的渗透与传播,弘扬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和平宽容、中正和谐的文化精神。

概言之,中国各族穆斯林的国际交往活动历来是中国开展国际文明交往与文明对话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代中国国际交往中人文外交的重要环节。海、陆丝绸之路之上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间的宗教交往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对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相互交往交流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我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改革开放、着力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新形势下,秉承历史传统,继往开来,促进中国与丝路沿线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宗教交往的良性互动,对于传承和发扬中国穆斯林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增进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友好关系,弘扬伊斯兰教中正和谐的普善精神与和平精神,释放和提振宗教文化正能量,维护世界和平,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15-10-09

[作者简介]丁俊,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研究甘肃基地研究员,国家民委重点人文社科基地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电邮:dingjun555@sina.com。上海 201620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Muslim's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Ding Jun

Abstract:For more than one thousand years, Chinese Muslim has been maintaining economic, cultural and religious relationships with Middle East people and keeping friendly exchanges with them. These friendly relationships and exchanges had taken a new step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da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hinese Muslim's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with more open and confident attitude will be very significance for preaching the peace spirit of Islam, guarding against all kinds of extreme thoughts, increas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ese Muslims and world Muslims, and promoting China's cultural diplomacy.

Key words:Chinese Muslim; Islam;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cultural diplomacy